

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和巴西文学

方 舟

巴西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巴西文学正是在巴西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数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以他们的聪明睿智反映这一变革的时代，表现整个民族的追求，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为世界文学宝库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学瑰宝，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巴西文学以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宣告独立为分野，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殖民地文学时期（1500—1822）和民族文学时期（1822—现在）。

巴西文学的第一个时期，即殖民地文学时期，始于葡萄牙殖民者发现美洲大陆之时。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的探险队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东海岸，揭开了葡萄牙美洲历史的新一页，从而开始了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史。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巴西殖民地文学时期。

在到达新大陆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殖民者没有达到他们寻找黄金和白银的初衷。然而，他们在巴西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发现了大量珍贵的红木——巴西木。从此开始了巴西经济的第一个周期：巴西木周期。对巴西木的采伐，伴随着殖民者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的掠夺和奴役。殖民者把他们在新大陆的遭遇以书信形式报告给葡萄牙王室。最早记

录发现新大陆经过和当地风土人情的应首推佩·瓦·德·卡米尼亚（？—1500）。随着殖民活动的开展，一些出生在葡萄牙的史学家、诗人和文学家也相继来到巴西，他们以史诗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殖民者的征讨活动，描绘了新大陆的自然风貌、人情习俗，从而创造了既受葡萄牙文化影响，又带有浓郁热带气息的早期殖民地文学。在这一时期较有成就的作家和作品有：若泽·德·安希埃塔神父（1534—1579）写的《历史报告和片断》和用拉丁语写成的祈祷诗；编年史家佩德罗·洛佩斯·德·索萨的《航海日记》；佩德罗·曼努埃尔·诺布雷加（1517—1570）的信札和加布列尔·苏亚雷斯·德·索萨的《巴西记实》等。

到十六世纪中叶，犹太难民把甘蔗引进巴西，在巴西东北部栽种并获得巨大成功。此后一个半世纪里，巴西进入甘蔗周期。十七世纪初，伴随甘蔗种植的大发展，巴西东北部成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巴西殖民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旺。在不可避免地受到欧洲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影响的同时，一种朦胧的民族意识已经在巴西文学中萌发。在巴伊亚，讽刺诗人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格拉（1633—1696）用优美的诗歌形式和犀利的笔锋揭露僧侣的伪善，官僚的贪婪，贵族的虚荣和自负，抨击殖民统治的黑暗，在早期殖民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主要作品有《圣诗集》、《抒情诗集》、《讽

刺诗集》等。

十七世纪末，在米纳斯吉拉斯发现含金层很厚的矿脉，在巴西第一次掀起“黄金热”。此后，巴西人口大量内迁，在矿区出现几个新兴城市。巴西的政治中心开始从东北部逐渐向中南部转移，中南部的文化得到发展，一批“米纳斯派”诗人的出现使那里成为殖民地诗歌的中心。与此同时，在南部沿海城市里约热内卢和东北部地区出现了一些文学团体，它们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和美国革命的自由思想的影响。其成员有重要史学家塞瓦斯蒂安·达·罗萨·皮塔，他著有重要的历史著作《葡萄牙美洲史》。

十八世纪初咖啡种植传入巴西，并在巴西丰沃的土地上繁衍开来，从此，巴西经济进入咖啡种植周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七十年代，建立在剥削黑人和印第安人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咖啡和棉花种植给巴西带来巨大的财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巴西文学界开始关注为社会创造如此巨大财富的奴隶阶级的生活和命运。在巴西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反映印第安人和黑人生活和斗争的作家和诗人。伟大的诗人若泽·巴西利奥·达·加马（1741—1795）写的叙事体长诗《乌拉圭》最具代表性。它叙述了1753—1759年乌拉圭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葡萄牙侵略的史实。诗人第一次塑造了反抗殖民统治的印第安人形象，讴歌了印第安人的古风，是巴西文学史上第一部著名诗作。同时，它也为巴西文学进入浪漫主义新时期作了准备。在这一时期，著名诗人克劳迪奥·科斯塔（1729—1789）和托马斯·安东尼奥·贡萨加（1744—1810）创立“海外阿卡迪亚”诗社组织，写出了一些优美动人的浪漫诗歌。科斯塔1773年以巴西种植园和矿工生活为题料写的长诗《里加别墅》，再现了劳动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悲惨遭遇；贡萨加在他的《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诗作中，叙述诗人与恋人悲欢离合的曲折动人的故事，以

奔放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表达他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成为一篇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代表作。若泽·德·桑塔·利塔·杜朗（1722—1784）写的《卡拉穆鲁》长诗赢得不朽声誉。它是依据十六世纪中叶阿尔瓦雷斯·科雷亚发现巴伊亚的曲折经历写成的。诗中叙述阿尔瓦雷斯同六名水手在巴伊亚附近海上沉了船，被印第安人俘获和吃掉，他因病幸免于难，后来，终于成为他们的头领，被尊为卡拉穆鲁（海里的龙），并同当地土人酋长的女儿帕拉瓜苏结婚。诗中描绘了巴西大自然旖旎风光和印第安人习俗，是早期史诗题材的重要作品。

十八世纪末，震撼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浪潮传到美洲，深刻地影响着南美洲各国。在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卢梭、狄德罗、伏尔泰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巴西先进的文学家力图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进行社会改革，追求人与人的平等，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要求建立本民族的文学。1789年在米纳斯吉拉斯，知识界名流包括一些诗人发起的以争取独立为宗旨的“拔牙者起义”，及以后相继爆发的反对葡萄牙统治、争取独立的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葡萄牙当局对巴西的统治，对争取巴西的独立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巴西民族文学的诞生作了思想准备。随着巴西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崩溃，一个以浪漫主义为先导的民族文学的新时期随即到来。

二

巴西文学的第二个时期，民族文学时期包括三个阶段：浪漫主义文学阶段（1822—1881）、现实主义文学阶段（1881—1922）和现代文学阶段（1922—现在）。

一、浪漫主义文学阶段

1808年葡萄牙王室为逃避拿破仑入侵，迁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王室迁至巴西后，

对巴西进行一系列改革：废除葡萄牙对巴西的长期贸易垄断，开放贸易通商口岸，振兴经济、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等。这些措施促进了巴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高了巴西在与葡萄牙交往中的政治地位，导致巴西最后由殖民地升格为王国。1821年葡萄牙王室迁回本土后，巴西摄政王佩德罗应人民的请求，留在巴西，并于1822年9月7日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激起巴西人民强烈的民族感情，增强巴西人民的独立意识。巴西民族文学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巴西浪漫主义文学除具有独立思想、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渴望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强烈的世界意识外，还存在一种强烈的寻“根”愿望，即强调对当地土著和对本国自然景观物的讴歌和崇拜，要求同葡萄牙彻底决裂，而同印第安主义相结合。因为印第安种族是巴西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第安人创造的古老文化是巴西文化的“根”。十六世纪中叶，奴隶买卖使大批非洲黑人源源不断地进入巴西，直到1888年奴隶制在巴西最终被废除为止的三个多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及其后裔在巴西的土地上劳动和生息，为巴西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巴西的进步文学家也把文学作品反映黑人的命运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以多明戈斯·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1811—1882）、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德—西尔瓦（1765—1838）和安东尼奥·佩雷斯·德·索萨·卡尔达斯（1762—1814）为代表。他们代表着从殖民地文学时期向民族文学时期过渡的先驱。马加良埃斯的诗歌充满盛行于欧洲的典型伤感情绪，他把人世间的悲哀寄托在宗教信仰中，但同时也尽情地描绘了巴西大自然的美，把感情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的《诗意的叹息和思念》是一部早其浪漫主义力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巴西浪漫主义文学进入兴盛时期。在巴西文坛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1864）。混血的出身赋予诗人以明显的巴西人性格和传统的灵感。他的诗歌多反映他抑郁的情怀和浪迹天涯的不幸遭遇。他的主要作品有：《美洲诗歌》、《廷比拉人》、《女奴》等。浪漫主义小说家若阿金·曼努埃尔·德·马塞多（1820—1882）提倡民族传统小说要有火热的感情，要注意环境的现实性，尽量运用幽默和通俗简炼的语言。他创作的《混血女郎》和《青年劳罗》是两部广为流传的佳作。若泽·阿伦卡尔（1829—1877）是十九世纪巴西浪漫主义小说家和戏剧家。他提出要在印第安主义和对本国大自然描写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巴西文学。他以清丽的文笔，富有诗意的语言把巴西各地的不同特点，如南方的大草原（《加乌乔》），海滨的农舍（《伊佩树的树干》），圣保罗高原（《蒂尔》）以及巴西的东北部（《腹地人》）等风光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城市小说中，他从不同角度反映巴西资产阶级生活和道德的悲剧。在印第安主义小说《瓜拉尼人》和《伊拉塞玛》中，作者生动地刻画了印第安人的形象，热情赞扬印第安少女内心的美。另一位浪漫主义小说家马塞多·西尔瓦·吉马朗埃斯·塔沃拉（1827—1884）的作品多以巴西腹地为背景，描述采金工人的悲惨遭遇。

十九世纪后半叶，在巴西诗坛上出现了一位倍受巴西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才华出众的浪漫主义诗人、反对奴隶制的战士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生活在巴西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巴西黑人奴隶倍受凌辱的悲惨处境，全世界舆论对奴隶制的同声谴责在巴西引起极大的反响。这给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虽然诗人仅活了二十四岁，但他毕生以诗歌为武器，为

奴隶们大声疾呼，同顽固维护奴隶制的保守势力进行不懈地斗争。他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被誉为“奴隶的歌手”。他的诗作气势磅礴，热情奔放，语言优美，富有感染力和想象力。主要诗作都搜集在《浮沫》和《奴隶集》中。

《海上的悲剧》(又称《黑奴船》)是阿尔维斯感人肺腑的悲壮诗篇。诗人对发生在运奴船上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罪行充满无比的憎恨；对奴隶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在《露西亚》的诗中，诗人通过一个美丽的黑奴少女的悲惨遭遇，对奴隶制的残忍和冷酷无情作了声泪俱下的控诉。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之后，浪漫主义文学开始向现实主义过渡。这一过渡时期的小说家有阿尔弗雷多·德·陶奈(1843—1899)、若阿金·贝尔纳多·吉马朗埃斯(1825—1884)。陶奈以小说《拉古纳的撤退》驰名文坛；贝尔纳多的作品则多叙述殖民地时期深入内地寻找矿藏和掠夺奴隶的“远征队”的悲惨遭遇，其主要作品有《淘金者》、《女奴伊佐拉》等。

二、现实主义文学阶段

十九世纪中叶，巴西的经济领域不断拓宽，生产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咖啡的广泛种植，大量欧、亚洲移民的到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发展和货币的改革促进了贸易的活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自由主义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在一些地区发起共和运动反对帝制；一些农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先后举行起义。十九世纪后期又出现纺织工人、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社会的进步必然反映到文学领域中来。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已不能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崭新的现代生活。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巴西圣保罗和累西腓的学院派青年首先举起现实主义旗帜，反对过时的浪漫主义，反对精神主

义和教会哲学。

在小说创作方面，一些反映巴西现实生活的小作家崭露头角。早期现实主义作家有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德·阿尔梅达(1831—1861)，他的《一个民兵军官的回忆录》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雏形。此外，阿方索·阿里诺斯和富兰克林·塔沃拉(1842—1888)的作品描述普通人的生活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西社会现实。

巴西第一部真正现实主义小说要算贡萨尔维斯·阿塞维多(1857—1913)的《姆拉托》(1881)。作家以敏锐的观察力，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勇敢地反映并抨击了巴西的现实。小说通过地主和黑种女奴的私生子莱蒙托博士的爱情悲剧，揭露教会的伪善和罪恶，猛烈鞭笞了世俗观念和种族偏见。阿塞维多的作品大多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如《女人的眼泪》、《经济公寓》、《寄宿舍》、《男人》等。另一位小说家因格拉斯·德·索萨(1850—1918)在小说《传教士》中，通过一名传教士的放荡不羁的私生活，揭露教会的伪善。他的其他作品有《一个渔夫的故事》、《桑格拉多上校》、《种可可的人》等，他的作品充满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和宿命论观点。

在现实主义文学阶段，巴西文坛上出现一位伟大的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他的作品被称为“巴西文学的最高表现”。在诗歌、戏剧、小说、评论等方面他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诗歌强调韵律、追求形式完美，具有高蹈主义(即帕尔纳斯派)文学特点。他的天赋发挥得最充分的方面是小说，代表作有《布拉兹·库巴斯的死后回忆》、《金卡斯·博尔巴》。作者遵循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注重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写，成为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但是，他的作品缺乏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强有力地批判。这个任务由巴西现实主义文学家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

(1866—1909) 完成了。

库尼亚在童年时代就耳闻目睹咖啡种植园的奴隶暴动及其非人遭遇。十九世纪末，他随政府军采访了腹地，亲眼看到1889年卡奴杜斯农民起义军的英勇斗争和政府军的残暴屠杀。血淋淋的现实使作家猛醒，创作了以这场震惊全国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腹地》。在小说中，他塑造了农民的典型，提出巴西社会的根本问题，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杰作，揭开了巴西文学的新的 pages。这部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人们很高赞誉，被称为“巴西的第二次发现”，成为巴西文学中的古典名著。1959年库尼亚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由于书中揭示了腹地农民起义的真相，控诉政府军犯下的罪行，他受到当局的仇视。就在库尼亚着手完成他的第二部宏文佳作《失去的乐园》时，遭到暗杀。

这一时期另一位有成就的小说家是格拉萨·阿拉尼亚(1868—1931)。他的代表作《伽南》通过两个移民青年之口，探讨巴西民族和国家的形成问题，被认为是典型的“问题小说”或“思想小说”，受到欧洲文学界的重视。他同库尼亚一起，被誉为巴西小说民族化的奠基人。若泽·本托·蒙特罗·洛巴托(1882—1948)以圣保罗城市生活为背景，开创了一条城市小说的创作道路。他的作品唤起巴西人民对社会问题的觉醒，揭示传统的农村和进步的城市之间的鸿沟，创作出《乌鲁佩斯》、《绿浪》、《死亡的城市》等作品。他还是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被誉为“巴西的安徒生”。

在诗歌创作方面，继浪漫主义诗歌之后，巴西诗歌曾一度出现单纯追求形式完美、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蹈派倾向。诗歌虽然优美清新，但却情调低沉，内容空泛。属于这一派的诗人有被称为“星星诗人”的奥拉沃·比拉克(1865—1918)和被称为“鸽子诗人”的赖蒙多·科雷亚(1860—1911)。

十九世纪末，在巴西诗坛上渴望表达内

心世界的象征主义流派兴起。它宣扬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作品充满颓废和悲观情调。黑人作家若奥·达·克鲁斯·伊·索萨(1861—1898年)以抒情散文形式写成的《弥撒书》和诗作《盾》，具有典型的象征主义特征。作者在诗中倾诉自己种族的哀怨，表达对远方的某种美好事物的潜意识预感。另一位象征派诗人是印欧混血作家塔维亚斯·巴雷托(1839—1889)。他的作品除流露出对种族偏见的艾怨外，还把英、法国历史上的法制观念引进巴西，揭露巴西社会的弊端。

三、现代文学阶段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欧洲文学艺术中出现一种反对学院派艺术、高蹈主义以及各种象征主义过时模式、追求现代性的倾向。它要求艺术摆脱传统的法典和规程，追求美学和文学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的表现形式，各种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都具有这种现代化倾向。继讲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出现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之后，巴西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也出现现代主义运动。1922年爆发了以圣保罗“现代艺术周”为发端的现代主义运动。里约热内卢“物力论”派的格拉萨·阿拉尼亚是这次运动的倡导者；圣保罗“原始派”的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和“圣保罗中心”最有影响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1893—1945)等人领导了运动。这次运动试图使民族生活和民族思想面向现代，提出文学民族化，反对脱离本民族实际、摹仿外国的沿海主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摒弃对葡萄牙文学准则的依赖；排除和扫清阻碍感情自由表达的形式主义以及寻求反映时代精神的表现手法的创作道路。于是，反映这一艺术倾向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如蒙特罗·洛巴托的《乌鲁佩斯》，曼努埃尔·班德拉的《狂欢节》，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充满幻觉的保利赛娅》等。

巴西的现代主义运动具有不同于西班牙

美洲文学现代主义的特点：从持续时间上看，巴西的现代主义运动从1922年起到1930年止，仅经历八年时间。随后便被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思潮所取代，其影响并不深远；而西班牙美洲的现代主义持续大约四十年之久，形成一种全新的流派，其影响之大甚至反馈到伊比利亚半岛。从其宗旨来看，前者没有可能提出和形成一条明确的文学创作道路，它旨在扫清阻碍思想感情自由表达的形式主义障碍，更多地注重“现代化”和创新，而不是美学本身；而后者则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思想主张，形成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表现。从结果来看，前者虽然也受到欧洲先锋派的影响，但由于过分提倡民族化，强调“巴西的实际”，以至走上极端，出现“原始派”、“美洲豹运动”，甚至办起《吃人肉者》杂志，宣扬理想主义，颂扬“好的野蛮”习俗；而后者则在广泛吸收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精萃的基础上，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大胆的革新，产生现代人的艺术，美洲人的艺术，较少地方主义乡土偏见。

现代主义运动宣告了巴西现代文学阶段的开始，它活跃了巴西的文学空气，唤起人们对文学创作道路的探索 and 追求，对巴西文坛起了醒愚警顽、震聋发聩的作用。1929—1931年，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给巴西带来深刻的影响，巴西社会动荡不定，工人、农民斗争席卷全国，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联盟。1930年10月，“自由主义者同盟”领袖热图利奥·瓦加斯组成临时政府，实行独裁统治。士兵起义和群众抗议活动遭到残酷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巴西文学的现代主义热情，由于对政治的担心而冷却下来。

现代主义强调巴西文学的整体性，同时也不排斥地区文学的发展，相反，巴西文学因为有一批优秀的地区小说家创作出生动的各具特色的地区小说，而显得更加丰富多

采。在地区小说家中，以若热·亚马多和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影响最大。

亚马多（1912— ）是当代杰出的巴西地区小说家，也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不仅在当代巴西文坛上享有盛名，而且具有国际声誉。由于他经常同下层人民保持接触，作品较好地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他的作品反映知识分子（《狂欢节之国》）、种植园农民（《可可》）、流浪儿（《沙滩上的船长们》）以及渔民（《死海》）的生活。他的以农村为题材的三部曲小说《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和《饥饿的道路》，对下层人民的遭遇寄予深切地同情，对地主阶级的暴行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掠夺和压迫作了彻底地揭露。1958年以后，亚马多又以妓女、流浪汉生活为题材写了《加布里埃拉，丁香和肉桂》、《浪女回归》、《喜悦与痛苦》、《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等作品。

以腹地为题材的小说家若奥·吉马朗埃斯·罗萨（1908—1967）是一位努力发掘地方语言的创新者。他的《广阔腹地：条条小路》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小说，被誉为巴西当代小说的高峰。作者借助腹地特定的环境，使用腹地人独特的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并把人物粗犷的土匪行径同细腻的内活动加以对比，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朴实无华而又极富创造力，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是一部在地区主义典型形式下表现整个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结构小说，堪称自现代主义运动以来巴西文坛上的一部成绩卓著的作品。此外，早年他还著有诗集《岩浆》和短篇小说《萨加拉那》以及后来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舞蹈团》和《初期的历史》。

若泽·林斯·多·雷戈（1901—1957）的作品以巴西东北部甘蔗种植园为题材，刻画了种植园工人的劳动、生活习俗、冲突与痛苦，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农村生活画卷。作品有《甘蔗种植园的孩子》、《死火》

等；描写腹地的小说《美丽的宝石》；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小说《小黑人里卡多》等。

另一位才情横溢的地区小说家格拉西利亚诺·拉穆斯（1892—1953）曾任巴西作家协会主席，在巴西现代文学中享有很高声誉，是东北部杰出的地区小说家之一。他文笔纯熟，用语精确洗炼，善长人物的心理描写。主要作品有《苦楚》、短篇小说集《枯竭的生命》等。

著名城市小说家埃里科·维里西莫（1905—1977）的作品主要描写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现代人的思想、活动和精神风貌，创造出许多栩栩如生而又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1933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充满人情味的小说《克拉丽萨》获得成功，受到文学界重视。随后又相继发表《十字路口》、《远方的音乐》、《太阳下的一处地方》、《看那田野里的百合花》等。小说再现了不同阶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场景，揭示了巴西社会的现实。他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以描写巴西南部社会发展的系列小说《时间与风》三部曲最著名，被认为是巴西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在诗歌方面，到五六十年代，随着先锋派诗歌的盛行，巴西诗坛出现形式主义倾向。在有关诗歌体裁革新的大辩论基础上，形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如具体派、新具体派、诗歌—实践派等。具体派以若奥·卡布拉尔·德·梅洛·内托为先导，他于1956年发表了具体主义诗作《两股泉水》。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有奥古斯托·德·坎波斯和阿罗尔多·德·坎波斯两兄弟，以及德西奥·皮格纳塔里。他们主张在诗歌创作上同传统的描写和抒情形式决裂，采用单个字母或单个词、符号等表现形式，大量使用省略法、暗示法。到1961年具体派诗歌因受到马里奥·莎米耶首创的“实践诗”的竞争而没落。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采用非语言的符号表达的形式，因而最终都否定了诗歌的

传统观念。

在此期间也出现过一些传统诗作，如热拉尔多·梅洛·莫朗继1964年发表了具有散文韵味的自由体长诗《莫朗家族之父》之后，1972年又发表了《热拉尔多的意外遭遇》，是两部具有自传性质的编年史长诗。穆里洛·门德斯的诗集《多面体》也受到人们的重视。

1964年以后，布朗库军政权实行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受到监禁、放逐或剥夺职业权利，巴西文学发展进入低潮时期。但是，军政府堵塞言路的作法唤起艺术家、作家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良知，激起他们更大的不满，尽管军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严密的查禁和控制，少数针砭现实、揭露时弊的作品还是躲过军政权的严密监视，破土而出。如安东尼奥·卡拉多1968年发表的反映巴西“1964年革命”时期当局镇压东北部地区群众文化活动的典型形势小说《瓜鲁佩》；叙述波希米亚知识分子投身武装斗争和最终被镇压的小说《堂·若奥酒巴》；阿里亚诺·苏亚苏纳1971年发表的政治小说《王国的宝石》；老作家恩里科·维里西莫1965年发表的《大使先生》和1971年发表的《安塔雷塔事件》等。在写作手法上，这一时期的作品多采用虚构的背景，恐怖、荒诞、离奇的情节，以达到掩人耳目、逃避检查的目的。

传记文学创作因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脱现实，风险较少，曾出现某些兴旺景象。自1933年温贝托·德·坎波斯完成了一部感情真挚的《回忆录》，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回忆录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逐渐兴旺起来。这在巴西文学史上是少有的现象。格拉西利亚诺·拉穆斯的《童年》，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一个没有职业的人》，奥古斯托·梅耶尔的《童年的秘密》和《花开时节》相继问世。特别是穆里洛·门德斯

（下转第23页）

5%^⑩。由于农业的生产缺乏资金，发展缓慢，其中粮食作物生产发展更是如此。

(四) 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战后，哥伦比亚商品农业虽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农业经济基础较差，整个农业生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首先，土地利用率低和土地使用不合理。1973年，全国经营土地面积二千八百五十万公顷，其中一千八百四十二万公顷土地进行放牧，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只有四百六十六万七千公顷。其次，农业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部门，现代化程度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68年，哥伦比亚只有3.6%的经营单位使用农业机器，4.8%的经营单位使用除草剂，11.3%的经营单位使用杀虫剂。1968年，哥伦比亚拥有拖拉机二万多台，同期阿根廷有十八万台，为哥伦比亚的九倍，墨西哥有七万台，为哥伦比亚的三点五倍，智利有二万五千台，乌拉圭有二万八千台，这两个国家比哥伦比亚小，拥有的拖拉机比哥伦比亚还要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同年，美国每个农业经济自立人口平均使用的农业机器为哥伦比亚的一百五十倍。1973年，哥伦比亚从事农业生产的经济自立人口为二百四十三万人，占全国经济自立人口的39.7%。可见，哥伦比亚农业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不少地区是靠天吃饭，

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

(五) 出口商品作物和粮食作物生产比例失调，粮食进口不断增加。七十年代，政府把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非传统产品放在优先地位，出口商品农业得到发展，但却忽视了传统作物生产，造成农业内部生产发展比例失调。据拉美经委会统计，1950—1972年，出口农作物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达8.2%，而传统作物只增长1%。战后，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迅速，对商品粮食需求扩大，国内粮食生产供不应求，粮食进口不断增加。据统计，1950—1954年年平均进口十一万吨，1970—1974年增加到四十九万九千吨，1983年达一百三十万吨。

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哥伦比亚农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改变哥伦比亚农业现状的宝贵意见。哥伦比亚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强调恢复农业生产、整顿财政、增加农业低息贷款、鼓励粮食生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支援农业生产，并对经济结构作了些调整。但看来，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并非易事，仍需要时间，哥伦比亚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需要走艰巨曲折的道路。

^⑩ 哥伦比亚《拉丁美洲时代》周刊，1981年1月号。

(上接第52页)

的《歌舞年华》(1970)和佩德罗·纳瓦的《骨木》(1972)把自传体小说推向高峰，成为七十年代初问世的重要著作。这些作品从内容上改变了纯资料性特点，而且有更大的艺术性；在表现手法上，延用了许多先锋派的创作手法，因而，作品既象自传，又象小说，更富有故事性和浪漫风格。

总之，巴西文学与巴西社会生活和历史变革是密不可分的。巴西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变革都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

题材，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促进文学事业的进步；同时，巴西文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又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变革，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出适合于表现社会现实特点、反映社会进步的文学形式，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巴西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实现，受军政府禁锢了二十多年的巴西文学，也在开始复苏，一个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必将到来。